

《文选》版本研究

傅刚 著

(本研究项目获得 1997 年博士后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 名: 《文选》版本研究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标准书号: ISBN 7-301- / .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千字

1999 年 月第一版 1999 年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元

目次

序	曹道衡
总论	

上篇 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

史志著录的《文选》版本
官修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文选》版本在明清的存藏和流传

中篇 《文选》版本叙录

一 写本

- (一) 永隆本《西京赋》(伯 2527, 伯 2528)
- (二) 《答客难》、《解嘲》(伯 2527)
- (三) 《恩癰传论》至《光武纪赞》(伯 2525)
- (四) 《王文宪集序》(伯 2542)
- (五) 《褚渊碑文》(伯 3345)
- (六) 《演连珠》(伯 2493)
- (七)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伯 2707)
- (八) 《会吟行》及乐府八首(伯 2554)
- (九) 《运命论》(伯 2645)
- (十) 《阳给事谏》(伯 3778、斯 5763)

- (十一)《石阙铭》(伯 5036)
- (十二)《登楼赋》(伯 3480)
- (十三)《啸赋》(斯 3663)
- (十四)《吴都赋》(01502)
- (十五)《文选序》(吐鲁番写本)
- (十六)《文选集注》

二 抄本

- (一)古抄《文选》残二十一卷
- (二)古抄《文选》卷七
- (三)九条家本
- (四)观智院本
- (五)三条家本

三 刻本

- (一)李善注本
 - 1 北宋天圣明道本
 - 2 尤刻本
- (二)五臣注本
 - 1 陈八郎本
 - 2 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锤家刻本
- (三)六家本
 - 1 秀州本
 - 2 明州本
- (四)六臣本
 - 1 赣州本
 - 2 建州本

下 篇 《文选》版本考论

论李善注《文选》版本

《文选》李善注原貌考论

永隆本《西京赋》非尽出李善本说

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本

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古钞无注三十卷本《文选》

《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辩

俄藏敦煌写本 242 号《文选》注发覆

论奎章阁本《文选》文献价值

《文选》敦煌写本研究

附录

论《文选》所载陆机《挽歌》三首——兼论宋本《乐府诗集》、《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

书名、人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总 论

一、《文选》版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文选》版本研究是“《文选》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这一研究的基础工作。由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故《文选》版本的研究直接对秦汉以迄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产生影响;其次,“《文选》学”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在封建文化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善注、五臣注的优劣构成了这一门学问的基本内容,但到底孰优孰劣,其版本的原貌如何,并没有明确的了解,因而争论的双方往往站在错误的立场进行错误的讨论。夙清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的系统,尽量恢复其原貌,从而确定《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实际文献价值,总结“《文选》学”这一门古老学术的研究经验、成绩及不足,是当代“选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文选》版本的研究,将对以后的全面整理《文选》,乃至整理汉魏六朝的文献,提供十分可靠的基础。

二、《文选》版本研究的历史、 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

关于《文选》版本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李善注是否从六臣注本抄出这一问题上,事实上这一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如萧统《文选》三十卷本原貌大致如何、李善注、五臣注版本的源流递变、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存写抄本与刻本的对比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注意,但意义重大的问题。

前人集中研究李善注本,是基于这样两个事实:一、从南宋以后,世重李善而贬五臣,因此产生了对李善注本整理的学术要求;二、又从南宋以来,单行李善注本世所罕传,北宋监本既不易得,即南宋尤袤刻本也难得一见,明末以迄清初,学界流行的是汲古阁本,而该本多有不合李善之处,故整理《文选》诸版本以图恢复李善原貌,便成为当时学术界一大任务。这一研究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胡克家《文选考异》为代表,其观点成为《文选》版本的权威结论,一直影响到今日。在他们之后,本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也集中研究了这一问题,所得结论亦同于胡克家。从此以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选考异》以及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所作出的共同结论:世无单李善注,现行李善注本系从六臣本中抄出,就成为定论。这就是前人关于《文选》版本研究的基本情况,也是学术界直到目前为止普遍信从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而致错的原因,与他们依据的版本密切有关。

我们先对四库馆臣的工作进行调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选注六十卷”条下说:“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我们看到,《四库提要》对李善注系从六臣本中摘出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四库馆臣的结论是依据于毛晋汲古阁本。的确,汲古阁本有《提要》所述六臣本特征,如果仅对汲古阁本下此结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说李善注本从南宋以来,“皆与五臣合刊”,就不合于事实了。因为存世的李善注单行本,起码有两种,即北宋天圣明道本和南宋尤袤刻本,而这两种刻本都没有《提要》所说的六臣本特征。因此,四库馆臣依据于汲古阁本对李善注下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四库馆臣之后,清嘉庆十四年(1809)江南布政使胡克家又约请当时著名版本学家顾广圻、彭兆荪对其所得尤袤刻本校勘重刻,并完成《文选考异》十卷。其结论是:“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何以言之?观其正文,则善与五臣已相麇杂,或沿前而有讹,或改旧而成误。悉心推究,莫不显然也。观其注,则题下篇中,各尝阑入吕向、刘良,颇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误取也。观其音,则当句每未刊五臣,注内间两存善读,割裂既时有之,删削殊复不少。崇贤旧观,失之弥远也。然则数百年来,徒据后出单行之善注,便云显庆勒成,已为如此,岂非大误!”从胡克家的工作看,他采用的底本是尤刻,比四库馆臣所据版本可靠得多了,但是尤刻本也并不能完全反映单行李善注本的真实面貌,它与单行李善注本即北宋的国子监本具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尤刻本参据了五臣本或六臣本,所以该本有一些五臣的特征,这样,胡克家的结论自然不适合单行李善注本,后人以之作为对所有李善注本的结论,就更是错误的了。

自胡克家以后,中国的学者基本上没有人再对《文选》版本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这或许是认为胡克家的意见已成定论,没有研究的必要。尤其是“五四”以后,“《文选》学”受到新文学革命的冲击,更少有人问津。倒是东邻日本,却掀起了《文选》研究的热潮,其中以斯波六郎博士的版本研究最为代表。斯波六郎博士先是自1937 - 1938年间写成《文选诸本的研究》,又从1949年开始,历时九年,编成《文选索引》一书。在《文选诸本的研究》一文中,斯波博士共调查了三十三种版本,并参考了唐写本《文选集注》和敦煌写本《西京赋》。他的结论是:“胡刻本的底本尤本所传承的不是唐代李善单注本,实为六臣注本,不过抽出了其中的李善注部分。因此可知胡克家在《文选考异序》中说的‘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竟为不易之论。但尤袤也决不至于仅从六臣注本中抽出李善注而不加改动,这一点亦见于袁说友的跋文:

‘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正如日本学界所称，斯波博士是六朝文学研究的泰斗，对《文选》的研究有着三十多年的历史（平冈武夫《关于文选索引的编纂和出版》，《文选索引》第一册序），因此斯波博士的研究结论被认为是不易之论。当然斯波博士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他和他的助手仅是为《文选索引》作准备，就作了二十五万张卡片；他的版本研究，不仅详细调查了三十三种版本，而且利用了唐代写本，这是胡克家等人没有见到因而也没有做过的工作，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首先从他使用的版本看，斯波六郎的研究共选择使用了李善注及李善、五臣合注版本三十三种，从数量上看，远远超过了胡克家，但是从版本的时代看，他所用宋版仅有六臣注的赣州本和《四部丛刊》影宋本，至于李善注本，最早的只是明翻元张伯颜本，他甚至连胡克家用过的尤刻本也没有见过。作为他李善注研究结论的依据，竟然只是胡刻本，而这个胡刻本也与中华书局 1977 年影印本以及中华书局 1974 年影印尤袤原刻本不完全相同，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结论的准确性的。其次，从斯波六郎的工作看，斯波博士关于李善注本的研究，可以分作两部分：首先他重新论证了胡克家关于世传李善注本是从六臣本中抄出的观点；其次他再论证胡刻本是“最存李善旧观者”。这个研究以及研究的结论，对斯波六郎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所面临的学术课题是，世无单李善注本，所有的（如他见到的胡刻）也是从六臣本中抄出者，在这种情况下，他通过比勘诸本，发现胡刻本（以及胡刻本的底本尤刻本）是保留李善注旧貌最多的版本。这对他以及他的时代说来，应该是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当我们现在知道了尤刻本与北宋监本的不同，知道了单李善注本一直存世，而尤刻本也并非从六臣本中抄出的事实时，才知道斯波博士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费尽气力论证的胡刻本，本来就是单行的李善本，当然也就是保留了最多的李善注旧观了。

从以上所论，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前人关于《文选》版本研究的

误断,主要是受到版本的限制,而对写本和刻本这两个不同阶段中的李善注和五臣注具有不同的特征,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对刻本与写本之间的关系、刻本与刻本之间异同的产生原因,也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点正是当代学者研究《文选》版本的立足点和切入点。

值得说明的是,对胡克家和斯波六郎等人的结论,当代学者有人进行了批评。比如程毅中、白化文二位先生曾于1976年《文物》第11期发表《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一文,以目录学和《文选》的版刻史料来否定“李善注《文选》出于六臣本”的观点。他们提出,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只有李善《文选》和五臣《文选》,唯独没有六臣本《文选》,所以不能说尤刻本是从六臣本中抄出;其次,根据现有的史料,最早的六臣本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刊刻,政和元年(1111)毕工的广都裴氏刻本,比起北宋监本李善注要晚好几十年,所以也不能说李善《文选》从六臣本中抄出。程、白二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无论是胡克家,还是斯波六郎,所论还都止于尤刻本,并没有指北宋监本。事实上,尤刻和监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的版本,这一点,程、白二氏也并不清楚,他们没有对尤刻和监本作过类似胡克家和斯波六郎所作过的校勘工作。就这一点说,程、白二氏的工作远没有胡克家和斯波博士的工作可信。

关于“李善本《文选》从六臣本抄出”的说法,学术界其实存在着一个误会,从我们前引四库馆臣、胡克家和斯波六郎三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提出结论时,都仅限于各自所依据的版本。如四库馆臣是对汲古阁本而言,胡克家是对尤刻本而言,斯波六郎是对胡刻本而言,但是后人却由之理解为对全部的李善本而言。这一者是因为他们在论述的时候,可能并不清晰所致,二者主要地还是读者根本不了解不同版本的李善注具有很大区别的原因。对此,程、白在批评《四库提要》时说:“可是他们又根据汲古阁本的一些错误,推论宋代人也未必真见单行本,那就太武断了。从此以后,

许多人沿袭了这种说法,认为现存的李注《文选》并非原本,而是从六臣本中重新摘抄出来的。”其实《提要》并未推论宋人也“未必真见单行本”,原话明指毛晋汲古阁本,而非指宋人。但是后人(包括程、白二氏)以为《提要》所指宋人也是事实。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产生的原因倒是要由四库馆臣以及胡克家等人负责的。因为他们虽然专就汲古阁本和胡刻本而言,却并不知道这两种版本与真正的单李善注本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意识里也是将这两种版本作为单李善注本的代表。因此他们的结论表面上是专就各自研究的版本而言,实质上也以为便是对全部单李善注本的结论,如《四库提要》说:“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这个说法当然不合乎事实,因此它虽然讨论的是汲古阁本,但却让人理解为是对所有的李善注本而言。后人正是受这样一种潜在的事实影响,或者赞成,或者反对。赞成的人固然将这结论置于全部李善注本之上,反对的人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批评,他们都混淆了汲古阁本、胡刻乃至尤刻与北宋国子监本之间的界限。由于这种混淆,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只能是错误的意见。

三、本人的工作和结论

如前所言,李善本《文选》是否从六臣本中摘出,只是《文选》版本研究的一个内容,除此以外,萧《选》三十卷本、五臣注本、六家本、六臣本,以及写本、抄本等等,都还有许多需要考核事实,理清线索,恢复旧貌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因此,本人的工作即在掌握现有版本的基础上,对上述内容进行全面地研究。

本人此次提交的博士后报告,共分三部分:上篇是“《文选》版本历代著录汇考”。《文选》版本的刻印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同样它在历史上的存传,也是需要清查的问题。通过对历代官、私藏书的

调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选》版本在不同时代的流传情况,并藉以考察《文选》在学术研究史中的地位。本人在查阅二百多种史志及官、私藏书志的基础上,对《文选》版本在历史上的收藏及流传进行了叙述和研究,首次理清了《文选》版本刻、存和流传的历史线索。本篇共含四个专题,一、史志著录的《文选》版本。调查的史书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和明焦 的《国史经籍志》。通过调查,对隋唐以来国家藏书中的《文选》版本,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二、官修目录中的《文选》版本。调查的官修目录有宋《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清《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续目》、以及《现存书目》、《录外书目》等。官修目录是各朝代国家的实际藏书,于作者、版本乃至书的内容等,往往有所解说,因此较史志更能反映书籍的当时面貌。比如《中兴馆阁书目》登录的李善本,详记分类,其中有今本《文选》失载的“难”体,这对于考订《文选》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当然官修目录也并不完全可靠,如《天禄琳琅书目》所记清宫内藏书,每书均有解题,在书名、函数、册数之下详记内容、考证、藏印等等,本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版本情况的复杂以及工作的不细致,将明版误录为宋版处不少。本文在登录时,都加以分析辨正,指明原书的错误。除了国内官私所藏外,《文选》版本由于各种原因流至国外,这主要集中在日本,其中有一些版本为我国所未有,这对于《文选》版本的研究,具有十分可贵的价值,基于这个原因,本文附录了一部分日本研究机构等所藏《文选》版本,以作《文选》版本研究的参考。三、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本文调查了藏有《文选》的宋、明、清私家目录共六十四种,对《文选》版本,首次作了比较清楚的梳理,对一些私家著录的错误,也作了纠正。四、《文选》版本在明清的存藏和流传。这里的版本主要是指宋、元版本。明清以来,宋、元版《文选》在民间存藏和流传的情况较为复杂,线索也不清楚,本篇根据

对各藏家的著录,又广稽笔记、题跋等,大致勾勒出其递藏的基本情况,对明清两代的《文选》版本学研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中篇是“《文选》版本叙录”。分“写本”、“抄本”、“刻本”三部分,“写本”部分共叙录十六种有价值的唐人写本,对唐代《文选》原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清理,同时对写本特征作了比较明确地分析,阐述了写本与刻本间传承演变的复杂关系。“抄本”部分择要介绍了在日本发现的五种古抄本,由于这些抄本的卷数多,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早期《文选》特征,对研究萧统《文选》三十卷本原貌极有帮助。“刻本”部分又分“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家本”和“六臣本”,共介绍、分析了八种宋刻本。关于“李善注本”,主要解决了李善本并非从六臣本中抄出的问题,指出单行李善本一直就有存传,后人所据的尤刻本与单行李善本并非同一系统,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可以用考察尤刻的结论作为单行李善本的结论;同时指出即使尤刻,也并非抄自六臣本,而仍然是以李善本(可能是李善的古写本)为底本,但参据了五臣或六臣本,因而有的地方与刻本六臣本特征相同。关于“五臣注本”,首次指出现存两种宋代刊本(陈八郎本和杭州锺家刻本)并非同一系统刊本,纠正了长期以来将这两种刊本混同的错误认识;同时指出杭州本与世传六臣本的底本五臣注相同,而陈八郎本则是以古写五臣本为底本但又参据了李善本(北宋监本),因此该本也具有李善本的某些特征;此外,李善、五臣的优劣,是“《文选》学”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校勘、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五臣本的版本价值,对前人的误说误信作了澄清。关于“六家本”,本文根据韩国奎章阁本,首次指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李善、五臣合并注本是刻于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的秀州州学本,而非史料所记的北宋崇宁五年(1106)镂版、政和元年(1111)毕工的广都裴氏刻本,后世所有的六家本和六臣本都从秀州本出。关于“六臣本”,进一步论证了斯波六郎关于六臣本“不是以单行李善注本、单行五臣注本为底本,所据是一个五臣李善注本,只不过颠倒

了李善与五臣的顺序”的观点。但本人还认为,六臣本的依据六家本,并不是简单地颠倒顺序,也并非“不是以单行李善注本、单行五臣注本为底本”,而是在以六家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又参据了单行李善本和五臣本;并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单行李善本和五臣本,与现存的李善本和五臣本有许多地方并不相同。这个材料对于研究宋代《文选》版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下篇是“《文选》版本考论”。由十篇(包括一篇附录)文章组成:1.《论李善注〈文选〉版本》,集中讨论李善注是否从六臣本抄出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关于《文选》版本研究工作过程和结论的调查,探清了他们所处的学术背景,所掌握文献的来源,工作的起点和立论的依据,首先指出他们结论是错误的,同时具体分析了这种错误结论产生的症结所在,使我们对前人研究工作的局限和不足,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其次,我们也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前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成绩,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态度。本文的调查表明,对前人研究过程、工作方法如果不作深入的考察,仅对其结论表示赞成或反对,可能会导致出一种更加不着边际的意见。2.《〈文选〉李善注原貌考论》,通过对唐代李善注写本的分析调查,探讨李善注本的原貌。本文在对写本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唐代写本至宋代刻本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后人常所依据的刻本李善注的一些特征,其实可能并不是原始李善本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对《文选》版本的研究,一要分为写本和刻本两个阶段,二对李善注和五臣注概念的使用必须加以限定。3.《永隆本〈西京赋〉非尽出李善本说》,本文详细分析了敦煌写本《西京赋》,验定这个公认为唐代李善注本残篇,其实并非纯粹的李善注本,而是以薛综注本为底本,又参校以李善注的合成本。根据这个结论,后人如斯波六郎博士,依据永隆本来判定刻本李善注本(尤本)非从单行李善本而出的观点,就十分地不可靠了。4.《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主要介绍现存四种五臣注本,其中三

种刻本,一种抄本。刻本中陈八郎本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宋刻本,杭州猫儿桥锺家刻本,仅存两卷。这两种宋本,不是同一系统,陈八郎本虽为完帙,但非纯粹的单行五臣注本,而是以五臣古本为主,又参据了北宋监本李善注。不过它虽非单行的五臣注本,却保留了许多后世刻本五臣注本所没有的古本五臣注特征,这是它的价值所在。杭州本虽非完帙,却与两宋以来六家本、六臣本的五臣注底本同一系统,它的单行本面貌,可以考定六家本和六臣本因合并而损失的原本特征。朝鲜正德年间刻本刊刻虽晚,但经过校勘,发现它与杭州本基本相同,完全可以用来充作杭州本使用。这就弥补了杭州本是残本的缺憾。值得格外说明的是,杭州本、朝鲜本与韩国奎章阁本的五臣注底本也基本相同,而奎章阁本的五臣注本,来自北宋的平昌孟氏,孟氏本则又来自五代蜀毋昭裔刻本,这样,杭州本和朝鲜刻本的文献价值,就十分地宝贵了。5.《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通过对残卷的考察,从十个方面指出残卷异于或胜于刻本的优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它对恢复萧统《文选》原貌所具有的文献价值。6.《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辩》。《文选》分类是《文选》版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一般遵从三十七类或三十八类说。最近台湾学者游志诚根据现存宋绍兴三十一年陈八郎本,提出三十九类说。本人经过调查,同意游说,同时在陈八郎本基础上,又从内证上找到萧统对《文选》分类编排的规定,同时在外证上根据宋人目录记载中记录有刻本所无的“难”体事实,以及朝鲜正德年间刻五臣注本、唐写《文选集注》和日本古抄九条家本等,都有“难”体的事实,充分论证了《文选》分类原为三十九类的观点。7.《我藏敦煌写本 242号〈文选注〉发覆》。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藏敦煌写本《文选注》,是不同于李善和五臣的注本。自本世纪初被从敦煌盗劫以后,一直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未向世人公布,只是最近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作出版。

本文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一写卷产生于唐太宗时期,不仅比李善注早,而且曾为李善以及后来的五臣所依据,因此这个写卷具有非常重要而珍贵的文献价值。8.《论奎章阁本〈文选〉文献价值》,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六家本《文选》,其底本是中国第一个六家合并注本秀州州学本,此本中国早已失传,且不见任何著录,因此它对研究六家本、六臣本《文选》的刊刻和流传,极具文献价值。此外,这个本子的李善注底本是北宋国子监刻本,五臣注本是北宋平昌孟氏刻本,这些本子也早已在中国失传,因此奎章阁本保存的秀州本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本文集中讨论奎章阁本这些独具的文献价值,指出它在《文选》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9.《敦煌写本研究》。本文详细研究了十二种敦煌写本,通过与各刻本、抄本,以及有关的史书、类书比勘,力图探查萧统三十卷本《文选》原貌。10.附录《论〈文选〉所载陆机〈挽歌〉三首兼论宋本〈乐府诗集〉、〈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录陆机《挽歌》佚诗的调查,与《文选》所载陆机三首《挽歌》进行对比研究,指出陆机所写《挽歌》并不仅此三首,《文选》所录是编者从作者“王侯挽歌”和“士庶挽歌”两组诗中选录的结果。由于《陆机集》早已佚失,因此后人搜辑整理《陆士衡集》,《文选》便成为主要依据。又不独《陆士衡集》,即《乐府诗集》的编辑,也多依靠《文选》。本文由陆机作品推论出《文选》一书对宋以后编辑古代作家作品,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汉魏六朝时期文学总集和别集,离不开对《文选》版本的研究。

上 篇

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